

Research o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Strategies of Shaoxing Dialect in Lu Xun's "Rural Novel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Semiotics—Taking *Divorce* as an Example

Mingyong Yang Yue Li* Ting Ma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Yunnan Minzu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650000, China

Abstract

Dialects are regional variants of a language, serving as living fossils and monuments of a place's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In Lu Xun's rural novel *Divorce*, a significant use of Shaoxing dialect vividly portrays the local character and adds a unique hue to the depiction of Shaoxing. The using of dialect enriches the cultural tapestry of Shaoxing. The author adopts sociosemiotic translation theory as a guiding principle and focuses o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the Shaoxing dialect in Lu Xun's *Divorce* by Yang Xianyi and his wife, as well as Wang Jizhen.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strategies for translating Shaoxing dialect into English, to enrich the dimensions of research, to strengthen cultural confidence, and to contribute to the modest effort of building China into a strong socialist cultural nation.

Keywords

social semiotics; rural novels; Shaoxing dialect; English translation strategies

社会符号学视角下鲁迅“乡土小说”中绍兴方言的英译策略研究——以《离婚》为例

杨明勇 李悦* 马婷

云南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 中国·云南 昆明 650000

摘要

方言是语言的地域变体,是一个地区的历史文化的活化石、活古迹。鲁迅乡土小说《离婚》中运用了大量的方言来描述绍兴,生动形象地展现了绍兴的面貌。方言的运用为绍兴增添了一抹别样的色彩。笔者以社会符号学翻译理论为指导,以杨宪益夫妇和王际真对鲁迅“乡土小说”《离婚》中绍兴方言的英译文本为主要研究对象,旨在通过研究,探究绍兴方言的英译策略,丰富研究维度,坚定文化自信,为将中国建设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尽一点绵薄之力。

关键词

社会符号学; 乡土小说; 绍兴方言; 英译策略

1 引言

鲁迅一生共作 34 篇小说,其小说内容元素万千,包罗万象,包括对封建社会的批判、对社会的关怀、对个人与集体关系的探讨以及对浙江绍兴地域文化的描写等等。该文章所研究的对象《离婚》这部作品创作于 1925 年,并于同年的 11 月 23 日在北京的《语丝》周刊第 54 期上发表。随后,该小说被收录在《彷徨》一书中,标志着鲁迅先生原创小说创作的终结^[1]。绍兴方言是吴方言中的一种。方言是语言

的地域变体^[2],是一个地区的历史文化的活化石、活古迹,学习和研究语言是认识人类、认识世界的重要活动,也是人提升自己的基础性的生命活动之一。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叙事和话语体系,需要有效地讲述中国的故事,传递中国的声音,以展示一个值得信赖、令人喜爱、值得尊敬的中国形象。同时,还需加强国际传播能力,提升其建设水平,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建立与中国整体实力和全球地位相称的国际话语权。”^[3]笔者对浙江绍兴方言进行英译研究,顺应国家的重大文化方针政策,与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文化强国”远景目标以及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的“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促进中国传统文化走出去”的理念相一致^[4]。

【作者简介】杨明勇(1998-),男,中国云南建水人,在读硕士,从事翻译研究。

【通讯作者】李悦(1975-),女,中国云南玉溪人,硕士,副教授,从事翻译理论、中外文化对比等研究。

2 社会符号学翻译理论的适用性

社会符号学翻译理论最早是由美国翻译理论家尤金·奈

达 (Eugene A. Nida) 提出。奈达在符号学的基础上, 创新性地将社会符号学的原理应用于翻译的学术研究与实际操作中, 从而发展出了社会符号学翻译方法。他认为翻译不仅仅是语言之间的转换, 更是文化之间的传递^[5]。即社会符号学翻译理论是一种将语言符号与社会文化联系起来, 通过翻译实现跨文化交流的翻译理论。在翻译过程中, 译者需要了解源语言和目标语言的文化背景、社会习俗、价值观等因素, 才能准确地将源语言中的文化信息传达给目标语言的读者。该项研究的主要目的是通过英译鲁迅小说《离婚》中的绍兴方言, 探析英译策略、让国际读者更加了解中国的地方文化, 促进文化交流。两者之间在理念上存在一致性, 因此将社会符号学翻译理论应用于鲁迅“乡土小说”《离婚》中绍兴方言的英译策略研究具有适用性与可行性。

3 《离婚》中绍兴方言的英译研究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方言的英译在让国际读者了解中国的地方文化, 促进文化交流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该研究内容与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文化强国”远景目标以及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的“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促进中国传统文化走出”的理念相一致。英译层面的研究主要包括鲁迅“乡土小说”《离婚》中绍兴方言翻译文本的语言特征、杨宪益夫妇和王际真英译本的对比分析以及鲁迅“乡土小说”《离婚》中绍兴方言的英译策略研究。

3.1 绍兴方言翻译文本的语言特征

鲁迅“乡土小说”《离婚》中绍兴方言研究翻译文本的语言特点涵盖两个方面: 一是翻译的普遍性特征, 二是特定语言对翻译文本语言特点的影响。

翻译的共性指的是所有翻译作品共有的、与原创文本相区别的特性, 这些特性的形成并不是由源语言和目标语言之间的差异所决定的。鲁迅“乡土小说”《离婚》中记录了大量的绍兴方言, 作为文化文本, 承担起传递文化信息的功能, 因此, 绍兴方言翻译文本具有信息传递的特征。此外, 同为翻译文本, 绍兴方言翻译文本还具有语言转换、文化适应性等特征。就语言转换而言, 翻译本身就涉及到两种语言或多种语言的转换, 将一种语言的表达方式转换为另一种语言的等效表达, 这不仅包括词汇和语法的转换, 还包括风格的适应和语言习惯的调整。关于文化适应性特征, 翻译文本需要考虑目标文化的特定文化背景, 就该文所涉及的绍兴方言, 作者对其进行英译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促进中国地方文化的对外研究, 加强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与交流, 因此, 绍兴方言翻译文本还具有文化适应性的特征。

特定语言对翻译文本的语言特点产生影响, 这体现在翻译作品的词汇选择、句子结构以及整体篇章的构建上。鲁迅在小说《离婚》中引用了大量的绍兴方言, 这些方言词汇具有独特的文化内涵、互通性和多样性特征。绍兴方言渊源古老, 历史悠久, 承载着绍兴地区的历史和记忆, 通过对绍

兴方言的研究和保护, 可以加深对绍兴地区文化的了解, 并促进地方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此外, 绍兴方言具有独特的互通性, 上海话、湖州话、杭州话、宁波话和苏州话等方言, 它们都属于吴语中的北部吴语分支, 也就是吴语太湖片, 彼此间互通度较高, 可以进行大致的交流。《离婚》中所出现的绍兴方言还具有多样性特征, 有人名及称呼语, 如七大人, 八公公; 骂言, 如老畜生、小畜生、逃生子; 地方特有表达, 如不落局、六畜不安、塞得发昏等; 风俗类方言, 如红绿帖、乌篷船等等。类别多样, 为绍兴方言增添一抹多元色彩。

3.2 英译策略之探——以王际真 & 杨宪益夫妇英译本为源

已故的华裔美国学者, 曾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中文系的王际真教授所翻译的 *Ah Q and Others: Selected Stories of Lusin* (Wang, 1941)^[6], 标志着鲁迅小说在英国的第二代翻译作品。杨宪益以及戴乃迭所翻译的 *Selected Stories of Lu Hsun* (Yang, Gladys, 1960)^[7], 标志着鲁迅小说在英国的第三代翻译作品, 曾受到了汉学家马悦然高度的评价; 这两本译本的作家在对《离婚》中的方言进行英译所采用的英译策略既有不同之处, 同时也有相同所在。

鲁迅在《离婚》中使用的方言多种多样, 呈现多元化的特点。笔者从风俗习惯、骂言及地方特有表达三个方面不完全统计了《离婚》出现的方言, 分析王际真和杨氏夫妇分别采取的翻译策略或翻译方法, 比较异同, 采取最大公约数, 从而探索出适用于大范畴方言文本英译的策略、方法以及技巧等。

首先是风俗习惯类方言, 笔者选取“会亲”“三茶六礼”“乌篷船”“年糕汤”进行分析:

例 1: “……这回是他家新年会亲, 连城里的七大人也在……” (鲁迅, 2005)^[8]

王译: “……This time they are entertaining relatives at the New Year, even His Honor Seven from the city is going to be there.”

杨氏译: “……Their family's having their New Year reunion now. Even Seventh Master from the city will be there.”

想要看译文是否忠实于原文, 首先需要弄明白原文的含义。“会亲”, 绍兴方言, 指联姻时两亲家设宴相会。王译“entertaining relatives at the New Year”——“新年宴请亲戚”; 杨氏译“having their New Year reunion now”——“过年吃团圆饭”。以“会亲”含义反观, 王译本和杨氏译本都偏离了原文所蕴含的意义。两个译文的问题是由缺乏对地方文化正确的解读所致。

例 2: “……我是三茶六礼定来的, 花轿台来的呵! ……” (鲁迅, 2005: 154)

王译: “...But my marriage was contracted with the three teas and six gifts, and I was brought over in a regular bridal sedan! ...”

杨氏译: “...I married him with the proper ceremonies-

three lots of tea and six presents-and was carried to his house in a bridal sedan ! ”

在绍兴方言中，“三茶六礼”指的是中国古代传统婚姻嫁娶过程中的一种习俗礼仪。这个成语中的“三茶”包括订婚仪式上的“下茶”，婚礼上的“定茶”，以及新婚夫妇同房时的“合茶”。而“六礼”则涵盖了从求婚到婚礼完成的整个婚姻过程，包括了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和亲迎这六个关键的仪式步骤。这一习俗体现了婚姻的正式性和严肃性，爱姑说这话强调自己是明媒正娶的正妻。王译“three teas and six gifts”，杨氏翻译成“the proper ceremonies—three lots of tea and six presents”。显然两者都采用了异化的翻译策略以及直译的翻译方法。但是论其准确度，杨氏夫妇增加了注释，“the proper ceremonies”强调了明媒正娶这一层含义，似乎更为充分，准确度更高，而且直译+注释的方法不仅保留了源语特色，且也利于目的语读者理解。因此，直译+注释的方法不失为一种能够很好应用于方言英译的好方法。

例3：“早望见门口一列地泊着四只乌篷船。”（鲁迅，2005）

王译：“There were four boats moored in a row at the house.”

杨氏：“Four boats with black awnings were moored in a row at the gate.”

乌篷船是中国江南地区特有的一种小型船只，尤其是在绍兴地区，乌篷船成为了一种文化象征和旅游特色。这种船以其独特的黑色船篷得名，用竹子和稻草制成。从两版译文中可以看出，王际真采用的是零翻译的翻译方法，而杨氏夫妇采用的是直译的翻译方法，“boats with black awnings”译出了乌篷船的形状，然而在材质的体现上稍有偏颇。笔者认为用直译+注释的方法，即将其处理为“boats with black awnings(made of bamboo and straw)”可能效果更好。

例4：当工人搬出年糕汤来时，爱姑不由得越加局促不安起来了，连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鲁迅，2005）

王译：By the time the New Year pudding soup was brought out, she became more uneasy than ever, without knowing why.

杨氏：When a servant brought in soup containing sweet New Year cakes, without knowing why, she felt even more uncomfortable and uneasy.

在中国，年糕是春节期间的传统食品之一，象征着年年高升、步步高（因为“糕”与“高”在汉语中谐音），寓意着来年的好运和进步。王译“the New Year pudding soup”，杨氏译“soup containing sweet New Year cakes”。两个译本都采用了异化的翻译策略，但前者用西餐甜点“布丁”代替“年糕”，牺牲了中国传统文化特色，可能导致读者不能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后者则保留了异域特色，既忠实于原文，又能让目的语读者对中国传统食物和中国传统文化有一定的了解。

其次是骂言，骂言在汉语中指的是辱骂或者恶言相向的话语。笔者选取“娘滥十十万人生”“贱胎”“娘杀”为

例进行对比分析。

例5：“那个‘娘滥十十万人生’的叫你‘逃生子’？”爱姑回转身去大声说……“……他那里有好声好气呵，开口‘贱胎’，闭口‘娘杀’。”（鲁迅，2005）

王译：“Which son of a hundred-thousand-men whore ever called you a bastard ? ” A-i ku turned around and protested loudly… “ … He never had a kind word for me. Whenever he opened his mouth, it was ‘offspring of a cheap womb’ by way of introduction, and ‘your mother’ s this and that’ by way of conclusion…”

杨氏：“Who the devil is calling you a bastard ? ” Aigu rounded on him fiercely… “ …He was always mean to me. It was ‘slut’ and ‘bitch’ all the time…”

“娘滥十十万人生”“贱胎”“娘杀”在绍兴方言里均为骂人的话，从两版译文中可以看出，前者偏向忠实于原文，采用了异化的翻译策略，传达出原文原有的意义；而后者则简略了一些含义，显然采用了归化的翻译策略，丢失了忠实性，不过可能更加利于读者理解。

综上，笔者发现王际真和杨宪益夫妇主要采用了异化的翻译策略，直译和直译+注释的翻译方法。可见，这些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能够适用于地方方言的英译中。

4 结语

地方方言作为一种独特的语言形式，承载着丰富的地域文化和历史信息。在进行方言的翻译工作时，翻译者面临着如何准确传达原文意义与保留方言特色的双重挑战。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翻译者可以采取多种策略和方法。对于具有深厚文化背景的地方方言来说，笔者认为以上几种策略和方法较为适用，忠实于原文，保留了异域特色和原文特点。当然，如果出现实在无法在目的语中找到对应词汇的情况，归化的翻译策略和意译的翻译方法也不失为好的选择。

参考文献

- [1] 汪宝荣,潘汉光.《离婚》中绍兴方言词翻译规范探析[J].绍兴文理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6):68-73.
- [2] 胡六月.方言英译原则初探——以绍兴方言为例[J].浙江外国语学院学报,2014(3):82-87.
- [3] 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EB/OL]. https://mp.weixin.qq.com/s/_euZCfUSTH6nFquTlJBtJQ.
- [4] 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EB/OL]. <https://mp.weixin.qq.com/s/lwkcKGNIDbaUqYRcY9nUyw>.
- [5] 刘倩.浅析“社会符号学”翻译理论应用[J].安徽文学,2013(10):142-143.
- [6] Lu, X. Ah Q and Others: Selected Stories of Lusin[M]. C. C. Wang (tran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41.
- [7] Lu, X. Selected Stories of Lu Hsun[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Press,1960.
- [8] 任宝根.鲁迅著作的江浙方言[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